

# 论容闳的科教思想及实践

黄晓东

(珠海市委宣传部,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长期留学海外的容闳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大力倡导“教育救国”思想,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积极进行“科教兴国”实践,意义十分重大:从觅“制器之器”到培养“制器之人”,促使中国人学习西方由“师夷长技”的器物层面,升华到“师夷长智”的文化层次,最早倡导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从而抓住了与民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教育制度,其文化意义已经深入到“精神层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据此可以说容闳是晚清思想界、文化界主张从制度层、精神核心层变革的最早倡导者。在此意义上说,容闳称得上是杰出的爱国者、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和中国现代化的卓越先驱。

**关键词:**容闳;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9)01-0107-05

“教育救国论”作为“科教兴国”的最初理论渊源,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数仁人志士都先后意识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落差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弥补这种落差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教育,只有发展新式教育事业,才是救亡中国的根本出路。郑观应甚至明确指出:“教育为立国之本”<sup>〔1〕270</sup>。但以“教育救国”为主要指导思想,并竭毕生精力付诸实践的,在整个晚清时期唯有中国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一人。他一生充满爱国情怀的教育思想和科教实践活动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近代中国教育史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 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

长期留学海外的容闳,从自己所受的西方教育中亲身体会到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感受到中国教育状况的落后,逐渐认识到科教救国的重要性。在大学时代他开始孕育有“教育救国”的思想,立志“以西方之学术,输灌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2〕389</sup>。而后,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不断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想体系。

(一)近代中国教育的模式与途径:大力发展留学教育;以西方现代教育为模式,创办新式学堂

容闳始终强调西化式的教育,认为中国教育应该以西方教育尤其是美国教育为模式。容闳一生的理想,就是移植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让更多的中国人像他一样,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教育,学习和掌握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用以改造中国,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

首先,容闳大力提倡海外留学教育,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sup>〔2〕339</sup>。早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他就提出了一个留学计划,“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sup>〔2〕379</sup>。1854年大学毕业时,容闳更是认定自己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使“中国年轻一代应当与我享受同样的教育利益;……此目标犹如一颗新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不管有多少艰难坎坷,也不管人生的沉浮盛衰,我都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忠贞不渝”<sup>〔3〕345</sup>。而后的几十年,容闳的确为实现史无前例的留学计划上下求索、呕心沥血。

但是,容闳并不主张全盘照搬西方。“予之教育计划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sup>〔2〕3105</sup>,他在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同时,数典而不忘祖。早在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为了学习中国文化,曾经千方百计地托人从国内捎中文书籍。到1854

收稿日期:2008-10-20

作者简介:黄晓东(1963—),男,珠海市委宣传部长,吉林大学政治学博士生。

容闳(1828—1912年)字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今珠海)南屏村。1847年留学美国,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我国第一个在海外获得学位的留学生。1855年回到祖国后,他以科教兴国为己任,创办工厂、革新教育、参与维新、推动共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逝世,终年84岁。著有英文传记《西学东渐记》。

年在耶鲁大学毕业时,容闳已经有了一定的中国文化素养,他给美国同学的赠言大都是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中国古典名言佳句,如“和为贵”“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有志者,事竟成”<sup>〔4〕</sup>等。幼童留美期间,容闳特别规定要“肄习西学,仍兼进中学”,并开列了一些中文课程给学生,希望他们学好中文,成为学贯中西的人才。同时,容闳还先后向耶鲁大学赠送了大量诸如《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在倡导西学之时,他也自觉促进东学西渐,使西学和东学、新学和旧学得到初步融会。可以说,文化价值观上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容闳教育思想最具价值的文化核心。

在回国之初,容闳在给太平天国的“七事”建言中建议:“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sup>〔2〕120</sup>,希望以美国新式教育为参照体系,在近代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制。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容闳从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一方面,主张创办各种新式学堂,在国内发展新教育事业,培养各种新式人才,建议“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建立海军学校”;“设立各种实业学校”<sup>〔2〕120</sup>。在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他又再次劝说曾国藩“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需要用国外机械及外国工程师”<sup>〔2〕146</sup>,希望让中国人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和掌握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更好地报效国家。

(二)近代中国教育的目标和任务:“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

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把“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看成近代中国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希望中国教育能培养出道德与知识并重、做人与为学并进的优秀人才。

容闳认为“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sup>〔2〕356</sup>,为此,容闳一方面注重“西方学术”的教授和学习。在幼童留美期间,容闳着重引导学生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着眼于中国所缺少的经世之学,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不同于传统士子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能顺应时代潮流、足当救国大任的栋梁之才。

另一方面,容闳提倡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树立爱国思想,使他们不甘屈辱,勇于反抗外来压迫。他说:封建教育使人“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sup>〔2〕30</sup>。因此,他主张:“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sup>〔2〕39</sup>。在监管留学生工作中,他引导学生把爱国思想作为学习的动力,溶入学生的操行中,让美国人民从这批学生身上看到中国人的美德,并且达到了目的。因此,在幼童被撤回之前,耶鲁大学校长波特说:“他们虽然年幼,但已懂得承担维护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荣誉的责任”<sup>〔3〕226</sup>。

这些都体现了容闳希望借助普及新式教育,塑造国人健康人格,唤醒民族和民主意识的先进思想,具有一定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色彩,实为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改造”之先声。

(三)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不是挽救腐朽的专制王朝,而是缔造“少年新中国”,实现现代化

容闳认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是“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sup>〔2〕149</sup>,即要用西方科学和教育来拯救危亡中的中国,使古老的中国在新时代变得更有生气。至于挽救衰朽的清王朝的命运,从来就不是容闳考虑的事。实际上,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第一人,容闳根本就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士子,不强调君臣纲纪,而重点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从来没有把中国与当时的清王朝等同,因此,在其《西学东渐记》中很少出现“清朝”字眼。

所以,回国之初,容闳就没有把维护清王朝作为自己考虑的目标,而是选择到清王朝的敌对阵营——太平天国那里寻找实现自己强国理想的可能。他给太平天国的“七事”建言说明了其教育思想已突破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改良的“教育救国”主张和政治理论的局限,跳出了“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与后来孙中山的主张既相近又超前。这些正说明了容闳挽救的是他心中的祖国——中国而不是腐朽专制的清王朝。

虽然后来容闳托迹于曾国藩幕府,参与洋务运动长达20余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清朝“同光中兴”的到来和延续有所作用。但这只是他个人理想与清政府对新型人才的渴求在那个时代相结合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他支持清政府。其实,他与洋务派有着根本的区别,洋务派的教育主张受制于“中体西用”的束缚,意在忠君,希望借西方现代科技来维持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而容闳的思想和实践远远突破了这种困扰,他的目的是借西学“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2〕389</sup>,意在爱国,而且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因此,“爱国而不忠君”是他与洋务派的最大分野。

正是因为这种质的根本区别,容闳能与时俱进,当留学计划夭折后,他由依附于“洋务”转而置身于“维新”。而后不久,又进一步深切感到“中国根本上之改革”已“不容稍缓”<sup>〔2〕144</sup>,于是,逐渐与共和、革命洪流连接起来,与孙中山先生最后会合到一起。

## 二、从觅“制器之器”到培养“制器之人”——容闳的科教兴国实践

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容闳不但开了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先河,更是近代“教育救国”论最坚决的先行者和实践者。考察他的实践,事实上已经突破了“教育救国”的纯教育范畴,而走向了“科教兴国”的宏观领域。具体观之,容闳一生的“科教兴国”实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觅“制器之器”,推动创办“江南制造局”,为农业文明下的中国创办了第一个近代工厂;二是培养“制器之人”,即通过长期的留学教育实践,培养中国一批新型的现代化人才。

(一)觅“制器之器”

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业已认识到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制造洋枪洋炮的重要性,并先后创办了安庆

军械所和苏州洋炮局等军事企业,但它们均不能制造机器工具,其中安庆机械所两年内都未能制造一艘轮船下水,所制山炮也不甚合式,演放炸弹未曾落地已先开花,致使曾国藩“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力,谋所以抵制之”<sup>[5]47</sup>。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种先进的“制器之器”和寻找“制器之器”的特殊人物。

1863年秋,容闳应曾国藩之召,赴安庆面见曾氏时建议:“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主张要从抓机械制造厂入手,建立基础工业,即“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每个和所有这些机器厂又能够生产特种机器以制造专门或具体的物件”<sup>[3]134-135</sup>。这个建议让曾国藩认识到采买外洋船炮“不如购其机器自行制造,经费较省,新旧悬殊”<sup>[6]3508</sup>,即要达到“自强”目的,必须建立“西式机器厂”,自己制造机器,而且制造机器的“母机”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两星期后,他委任容闳“至美购办机器,以为中国建设机器厂之设备”<sup>[2]141</sup>。容闳觉得这是实现“科教兴国”梦想的一个良好机会,便于1863年10月动身赴美,次年与美国马萨诸塞洲一家机器公司按照“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sup>[2]111</sup>的规格和要求签订了合约。1865年春,容闳将一百几十台配套齐全、功能先进的“母机”运抵上海,并请来相关技术人员,把机器安装在上海西北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厂内。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个先进的机器制造厂——江南制造总局建立。

容闳这次建议并成功地从美国购买“制器之器”,意义极大:超越了“制器”的初级层面,上升到“觅制器之器”的新境界。这是容闳自己——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才运用自己所学到的学识为国服务的一种突出表现,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技术走向深入的重要体现,还是“科教兴国”实际效果的一个最早演示。从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sup>[7]</sup>成为洋务派的共识,科教兴国的行动也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

## (二)培养“制器之人”

“制器之器”的出现必然呼唤“制器之人”的到来,而且容闳从美国购买“制器之器”的成功也为促成幼童留美打下了相互信任的合作基础。这些为容闳“科教兴国”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准备了必要条件。

受容闳购买“制器之器”的影响,洋务派部分官员进一步意识到,要把西方先进科技学到手,从仿造进而自己设计制造,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而这需要拥有先进科学知识的新式人才。基于此,李鸿章等人提出了培养“制器之人”的主张。

培养“制器之人”的良策莫过于发展新式教育,而这与容闳一生最核心的教育思想与重要的教育实践更是不谋而合。容闳的新教育实践主要包括两部分:建立新式学校、促成并主持幼童留美。

先看容闳倡议和参与建设建立的新式学校。主要有:1867年,容闳趁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总局各先进设备时,向曾提出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的主张。后来被曾所采纳,我国近代第一所技工职业学校由此诞生。1871年,容闳

带头捐出500两白银,在家乡香山县南屏乡发动乡亲创办甄贤义学,其后又从美国邮寄回300两银子,促使甄贤义学顺利开办,这是华侨在故乡兴办最早的私塾之一<sup>[8]319,1001</sup>,后来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广东著名新式初、高级小学。

促成并主持幼童留美,这是容闳一生最伟大的贡献。1868年,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交“条陈四则”,认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洋,以为国家储才”<sup>[2]86</sup>,并详细阐述了其留学计划。1870年,在容闳多次推动下,曾国藩与丁日昌等联名上奏,请求“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1871年初,清廷采纳奏折,殊批“着照所请”<sup>[9]386-87</sup>,随后在上海成立出国预备学校,任命陈兰彬、容闳为留洋正、副监督,筹备留学事宜。从1872年到1875年,在容闳的策划、组织、督导下,清政府先后分四批共派出120名幼童留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从工业生产到工业教育、从引进机器到培养人才的质的飞跃。

在幼童留美期间,容闳与先后出任留学生监督的陈兰彬、吴子登等在具体事务上发生冲突,容闳允许幼童“终日饱吸自由空气……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sup>[2]137</sup>,而后者污蔑留学生“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有害于社会”。1880年代,因为美国发生排华运动,限制中国移民的数额,拒绝中国幼童进入“陆海军学校”学习。一些人又借机攻击容闳,吴子登又书清政府,“谓学生居美已久,在理亦当招回”,建议“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并强调“能早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sup>[2]104</sup>。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也默然同意奕訢上奏将出洋学生一律撤回。1881年暑假,清政府下诏决定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在美留学生。1881年7月,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当年赴美的120名幼童,除因病因事中途撤回和这次不愿回国者共26名外,其余94人都先后回国。

关于幼童留美计划猝然夭折,学术界一般将其归因于“改革与反改革,洋务与守旧之间的冲突”,并把陈兰彬、吴子登等划归为不知改革的顽固派代表。笔者认为,国内顽固派造成的守旧气氛是幼童留美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合作双方——洋务派与容闳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态度的根本差别上。陈兰彬、吴子登他们也不是不懂西学,吴子登甚至对数学、化学、照相技术等西学颇有研究,在当时属于比较开明的洋务派人士,是幼童留美之所以成行的促进力量。然而,他们执行的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即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只能局限于器物层,对制度层和精神核心层则是万万不能触及的。而容闳心目中的西学,是一整套以美国为模式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体系。他希望这些留学生幼童在“饱吸自由空气”后,从制度层面和精神核心层面入手,对封建的中国进行根本性的资本主义改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双方的决裂从合作之初就已经注定。

虽然留美幼童未能完成预定的学业计划,但经过这番不懈努力,容闳还是把洋务运动从觅“制器之器”的层次推

进到培养“制器之人”的文化层次，为近代中国造就了首批科技文化人才，成为其“科教兴国”实践的主要体现。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很快就能为中国“培养各种类型的机械工程师和机械工人”<sup>〔3〕154</sup>，被人称为是容闳在“科教兴国”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具有初试锋芒，首战告捷的意义。幼童留美虽然提前回国，但后来他们“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逐渐成长为与传统士子炯异的优秀新式人才，据高宗鲁统计，这批留学生后来的职业和岗位见表1。

表1 留美幼童成长后的职业和岗位表<sup>〔10〕451, 152</sup>

职务	人数	职务	人数	职务	人数	职务	人数
国务总理	1	外交部长	1	海军将军	4	海军舰长	4
海军军区	3	海军军官	8	转入商界	8	工矿产业	7
铁路局长	6	铁路官员	14	电报局长	4	电报官员	6
兵器工厂	2	外交官员	11	大学校长	2	政府公职	7
侍郎	1	公使	1	教师	1	报业	1
海关	1	律师	1				

由表1可见，这些留学生大都成为近代科技文化各领域的骨干和创始人，可谓“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sup>〔2〕169</sup>。其中知名者有：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煤矿工程师吴仰曾、采矿工程师邝荣光、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江西电报局局长梁金荣、清末舰队司令吴应科、民初交通总长和外交部长梁敦彦等。“他们促进了中国的富强进步，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邦之中”<sup>〔11〕172</sup>，在中国向西方学习和加快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的成功，显现和深化了容闳“科教兴国”实践的历史意义。

### 三、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容闳的历史地位

由上所述“教育救国”思想和“科教兴国”实践可见，容闳是杰出的爱国者、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容闳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虽然早年长期留学美国，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没有忘记改造中国的使命。如章开沅先生所言：“他留学美国的起因和归宿都是以近代西学改造中国，而不是纯粹地归化西方”<sup>〔12〕375</sup>。早在留学期间，他就明确表示：“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sup>〔2〕389</sup>。而后他“胸怀松柏之志，常葆赤子之心，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谋求中国的复兴与富强”<sup>〔13〕</sup>。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言，容闳“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sup>〔2〕195</sup>。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科教兴国”实践，是为了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sup>〔2〕149</sup>，也充分体现着他热烈而恒久的爱国情操。难得可贵的是，容闳的爱国情操又能够跳出“华尊夷卑”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开放的文化视野，以科教兴国为切入点，致力于“西学东渐”和“东

学西渐”的互动，努力寻求多元文化间的吸收借鉴与和谐对话，这种开放兼容的文化胸怀和文化风范，对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容闳是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正如舒新城先生所言：“无容闳，虽不一定说无留学，即有，也不会如此之早……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sup>〔14〕2</sup>。他主持的幼童留美启动了中国百年留学教育大潮，是“中华创始之举”和“古来未有之事”<sup>〔9〕30</sup>。可以说，近代中国的三次留学高潮都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幼童留美诱发了福建船政学堂留欧教育的出现，直接促成了19世纪下半期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兴起。甲午战争之后，他建议张之洞“派有才之学生”陪同“练习”，潜在地推动了从1896年起步的留日潮的到来。20世纪初，梁诚、梁敦彦、唐国安等当年的留美幼童在容闳精神的影响下，不畏艰难，促成了庚子赔款留美教育的出现，复活了容闳当年的教育计划，开启了发生在清末，延续到民初的中国第三次留学高潮。而后留学教育延续至今，涓滴细流共同汇成了20世纪初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洪流。追本溯源，都是容闳开创的留学事业的继续和发展。

容闳是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首先，觅“制器之器”，为中国工业的近代化奠定基础。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洋务派止步于“师夷长技”的器物层，而且一开始仅限于低级“制器”层面，是容闳促动、并成功地引入“制器之器”，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第一个先进的机器制造厂、远东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军民两用企业，以比较高的起点迈出了洋务企业形成和发展的第一步，为中国近代工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容闳输入的“制器之器”是成套机器，代表了先进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给腐朽的封建满清肌体输入新的活力，促使中国在近代化航程上开始破冰之旅。

其次，培养“制器之人”，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容闳以西方新式教育为参照体系，力图在近代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制，直接否定了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度，成为众多有志之士的共识，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变。而其开拓的留学教育本身就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大批留学生如期回国后，在教育战线任职，大力改革教育，加快了教育近代化的建设。如后出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唐国安，励精图治，整顿校风，改革课程，培育名师，全面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为以后升格为清华大学奠定了坚实的教育基础。林联辉回国后又就读于天津总督医院附设医学馆，而后留校任教，最终成长为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北洋医学堂的首任校长，对中国西医学教育的初步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容闳从觅“制器之器”到培养“制器之人”，促使中国人学习西方由“师夷长技”的器物层面升华到“师夷长智”的文化层次，抓住了与民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教育制度，是最早倡导了制度层面的变革的明证。他的教育思想也处处闪耀着“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火花，其文化意义已经深入“精神层”，其思想深度甚至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肩。可以说，容闳是制度层、精神核心层变革的最早倡

导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甚至可以说容闳是鼓吹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

#### 四、余论

由于长期在海外,容闳中文水平不高,没有中文著作传世,也未把其政治理论纲领系统化,加之极“左”思潮的影响,容闳的历史地位长期被低估,甚至被人贬称为“洋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容闳的历史地位日渐被学术界重新认识。尤其是近年来,海内外也掀起了一股浓浓的“容闳热”,容闳正在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国际影响。2004年,美国哈特福德市于宣布11月17日为“容闳日”;2006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专门提到了容闳,耶鲁大学校方方向胡锦涛赠送的礼物是一幅

容闳画像;容闳还成为塑像矗立在耶鲁校园的第一个中国人。同时,容闳的家乡珠海也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2003年珠海出版社出版《容闳传》,2004年底举办“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暨《容闳与科教兴国》学术研讨会”,2005年底举办第二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并赴美向耶鲁大学赠送容闳铜像。2006年,珠海积极筹办中国留学生博物馆,11月,在珠海举办“中国留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出版一批近代留学文化研究史料,积极致力于将珠海打造成为“留学生之城”,容闳研究和近代留学生研究已蔚然成风。今天,我们共同重温容闳的教育思想,回顾他的科教实践,缅怀他的爱国情操,重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对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郑观应.致伍秩庸先生书.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2]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3]石霓.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 [4]章开沅.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J].浙江社会科学,1999(1).
- [5]夏东元.洋务运动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M].上海:上海书局,1979.
- [8]广东省志·华侨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珠海市志[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
- [9]徐学恂,田正平.中国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 [10]高宗鲁.容闳与中国留美幼童,容闳与中国近代化[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1]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转引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2]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评述,容闳与中国近代化[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3]刘中国,黄晓东.容闳传[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
- [14]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7.

(责任编辑:文牛)